

韩国高丽朝辞赋综论

白承锡

(东国大学 中文系, 韩国)

摘要:韩国高丽朝文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结合自身的文化习惯特点,以高贵的兴趣创作了众多汉文辞赋作品,其内容有写景、记事、咏物、抒情、言志,其体式则有唐宋后的律赋及先秦、汉魏六朝的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风格多样而灵活。这既是韩国宝贵的历史文学遗产,又表明中韩文化交流的源远流长。

关键词:韩国;高丽朝;辞赋;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5)01-0075-07

韩国高丽王朝是继统一的新罗王朝后,在公元918年由太祖王建(877—943)建立,公元1392年被朝鲜王朝所推翻,前后共470余年,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宋元朝时期。此时期并尊儒佛,且在国家的奖励之下,文风兴起,形成一时汉文学独盛之文坛。崔滋《补闲集》中曾综合论之,如:

我本朝,以人文化成,贤俊间出,赞扬风化。光宗显德五年,始辟春闱,举贤良文学之士,玄鹤来仪。时则王融赵翼徐熙金策,才之雄者也。赵景显数代间,李梦游柳邦宪,以文显,郑倍杰高凝,以词赋进,崔文献公冲,命世兴儒,吾道大行,至于文庙时,声明文物粲然大备,当时蒙宰崔惟善,以王佐之才,著述精妙,平章事李靖恭崔奭,参政文正李灵干郑惟产,学士金行琼虚坦,济济比肩,文王以宁。厥后朴寅亮……星月交辉,汉文唐诗,于斯为盛。

由以上的记载,窥知这时期的文人学士之多,竞参诗文创活动之盛,轰动一时,颇为惊人。这是汉字

传到古代韩国以后,汉文学形成的第一次高潮。

其实,15世纪韩国发明自有的文字(HanGul)以前,汉字是唯一的书写工具。汉字何时传入古代韩国,现无法考究确切的年代,但一般认定汉字早在箕子朝鲜时代即已传来,经汉四郡时代到高句丽、百济、新罗等三国时代,朝野皆利用汉文记录自己的历史及写作政治外交文书,汉字的使用是完全普遍化了,因而也开始出现表达个人情感的汉文学了。从《旧唐书》可知,韩国人从小就学习经史及文学方面书籍,如:

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肩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

这是《旧唐书》卷一九九《列传》一四九“高丽条”的记载。在此所言之高丽,就是指三国时代的高句丽。我们由此可窥知当时人特别爱读《文选》,因而可能对当时文士的写作产生深厚的影响。就诗、散文、辞赋等的文学创作,与《文选》流传有密切关系。

新罗统一三国以后,为培养人才,设立国家教育

收稿日期:2004-10-12

作者简介:白承锡(1954—),男,韩国东国大学中文系教授。

机关——国学,在其教学课程中,《文选》是作为最重要的学习对象。又为考核录用官僚,设置了读书三品科——这是按照读书的程度划分上中下三品的官僚等级。种种经史书籍当中,《文选》就是属于上品的最高官僚所必须熟读的书目。范文澜也说过:

新罗设国学,以经史及《文选》取士,不断出现擅长汉文的名家。初唐时,强首即以文章家著名,长安的新罗学生多登唐科第,长于诗文。像强首这样的文章家和留学于唐而登科第的一批人,都各有诗文流传至今,但其数量为极少数,尤其现在能看到的辞赋是只有崔致远的《咏晓》一篇。因此它被认为是韩国汉文学上第一篇辞赋作品。从文献的记载,不难看出高句丽、新罗等时代受《文选》的影响,文人学士以《文选》为创作的典范,而可能产生不少文学作品,不过我们现在无法窥知那时期创作的全貌,这主要是由于频繁的战乱,文献无法保存而传下来的缘故。再看《雅亭遗稿》一书:

又问胜国以上文献之无征,公叹曰:唐李绩,既平高句丽,聚东方典籍于平壤,忌其文物不让中朝,举以焚之。新罗之末,甄萱据完山,输置三国之遗书,及其败也,荡为灰烬,此三千年来二大厄也。

总之,现在唯一可欣赏的这时期辞赋作品《咏晓》,作者是崔致远(857—?),他是12岁时到唐朝留学,后来中进士,任宣州溧水县尉。唐黄巢作难时,为诸道兴马都统高骈,写《讨黄巢檄》而颇受重视,文名驰于时。他有一本文集——《桂苑笔耕》传于后代。现看一看《咏晓》全文:

玉漏已滴,银河已回。仿佛而山川渐变,参差而物象将开。高低之烟景微分,认云间之官殿;远近之轩车齐动,生陌上之尘埃。晃荡天隅,葱胧日域。残星映远林之梢,宿雾敛长郊之色。华亭风里,依依而鹤唳犹闻;巴峡月中,迢迢而猿啼已息。隐映青帘,村回而鹤鸣茅屋;蕙微朱阁,巢空而燕语雕梁。罢斗刁于柳营之内,伊簪笏于桂殿之傍。边城之牧马频嘶,平沙漠漠;远江之孤帆尽去,古岸苍苍。渔笛声浏,蓬草露晞。千山之翠岚高下,四野之风烟深浅。谁家碧槛,鸡啼而罗幕犹垂;几处华堂,梦觉而珠帘未卷。是夜寰荣哢,天地晴。苍茫千里,瞳咙八紘。潦水泛红霞之影,疏钟传紫禁之声。置思归于深闺,纱窗渐白;卧愁人于古屋,暗榻

才明。俄而曙色未分,晨光欲发。数行南飞之雁,一片西倾之月。动商路独行之子,旅馆犹扃;驻孤城百战之师,胡笳未歇。砧杵声寒,林峦影疏。断凄音于四壁,肃霜华于远墟。妆成金屋之中,青蛾正画;宴罢琼楼之上,红烛空余。及其气爽清晨,魂澄碧落。蔼高影于夷夏,荡回阴于岩壑。千门万户兮始开,洞乾坤之寥廓。

运用典故和华靡的修辞,极尽描绘了宫廷和市井的清晨情景,为一篇典型的唐末时期的律赋。中国律赋到了唐末,已经摆脱科举功名的约束,变成了抒情小赋的形式。崔致远的《咏晓》也诚实地跟从当时律赋创作的倾向,其内容形式与唐末律赋毫无差别。他虽然是新罗人,但他创作辞赋的能力,不逊色于当时中国文人,真不愧“海东孔子”之称号。

此外,他的文集《桂苑笔耕》里曾提到“私试今体赋五首”,但已散逸,现无法得知其赋的内容和形式。只是他自己表明“今体赋”,而知那些也是当时流行的律赋形式的作品罢了。

二

到了高丽时代,更多文人参与辞赋文学创作的活动。这与当时实施中国式科举制度有关系,在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下,国家由此开科举制度选拔人才。《高丽史·选举志》云:

光宗九年五月,双冀献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十一年,只试诗赋颂。十五年,复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

科举考试科目以诗、赋、颂、时务为主,这正与《文选》的编撰宗旨和内容相吻合。因此,高丽时代实行此制度以后,如同中国文人应试中举必须“熟精《文选》理”一样,当时社会上读《文选》,学《文选》的风气更加兴盛起来。徐居正(1420—1488)《东人诗话》中提起而赞叹之:“高丽光显以后,文士辈出,辞赋四六骈纤,非后人所及。”可以说当时文士以《文选》为典范,吸收其营养而创作自己的辞赋和四六骈文。这有传下来少数作品为例证的。如崔滋(1187—1260)写的《三都赋》,此赋一般认为模拟左思《三都赋》之作。崔滋的《三都赋》共有2500余字,假设问答的形式,描写高丽时代的西都(平壤)、北京(松都)、江都(江华岛)。这篇是蒙古军侵入高丽,而当时的武人政权

将首都迁到江华岛前后时创作的。此篇一开首出现三个虚构人物,如:

西都辨生,与北京谈叟,来游江都,遇一正议大夫,大夫曰:蒙闻二国之名,未睹共制,幸今邂逅二客,请摅怀旧之情,弘我以两京。

西都的辨生(好辩论的青年)与北京的谈叟(好谈论的老人)为二客,江都的正议大夫(议论正直的大夫)为一主,假设三处三人,分为主客,引出本文问答。这种虚构人物全部在篇首出现的方式,不同于左思《三都赋》谋篇布局,反而同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主客篇首皆叙出。由这一点形式可知,崔滋的《三都赋》并不是盲目地模拟左思的《三都赋》的。假设主客问答的方式是汉赋的主要形式之一,崔滋这样的形式运用,颇为灵活。

主客三人出场以后,客体之一的辨生就接受主体正议大夫的邀请,尽力描绘西都的开都神话故事,文云:

辨生曰:唯唯。西都之创先也,帝号东明,降自九玄,乃眷下士,此维宅焉。匪基匪筑,化城屹然。乘五龙车,上天下天,导以百神,从以列仙。熊渊遇女,来往翩翩。江心有石,曰朝天台。况兮盘陀,忽焉崦嵫,惟帝时升,神驭徘徊。灵祇所宅,平壤其祠。呼叱风伯,指挥雨师,怒则白日霰雷,木石交飞。又有木覓,稼穡是司,不耕而禾,积如京坻,荫公庇私,介以龙褱,若是何如?大夫曰:神怪茫诞,何以夸为。

此后通过主客二问二答,描写西都的地理环境和出产物。看本文的文意,在正议大夫和辨生的二问二答后面,应该还有二人的打圆场的对话,然后要有正议大夫和谈叟的话引出介绍北京的问答。但这些都残缺,不得而知。在没有转折的环节部分而直接出现谈叟描写北京的地理环境之谈论,文云:

作千载若符,先有崔孤云者尝曰:圣人之气,酝酿山阳,鹤岭松青,鸡林叶黄。紫云未起,预谶兴亡。铁原宝镜,堕自上苍,先鸡后鸭,斯言孔彰。及乎统合三土,卜开明堂,北蟻牛卧,南峙龙翔,右怀左抱,案花相当。八头三尾,东岷西冈,隐鳞屈伏,臂角拳商,腾精降神,吐气产祥。五川灵派,源乎森茫,万洞济集,流涨滂洋,箭驰轮走,朝奏中央,涵灵注德,滋养百昌。青松茂矣,三百余霜,中衰复盛,系于苞桑。自古如我应谶立国,有几帝王?

接这段落以后,通过主客四问四答,而描写北京的物产之盛及当时武人政权豪华奢侈,苛敛诛求的现状等,这些就是当时朝廷的武人集团不能防备蒙古军,而不得不迁都的理由。最后,引出正议大夫之论,辨生与谈叟二人为客体,发问主体为正议大夫。文云:

大夫曰:噫,旧都之流离盖以此。于是西北二客,奋髯作色,且怒且愠曰:走等终日言,而大夫皆折之,愿闻江都之说。

接下来通过四问四答,表明作者的救国之论,就是要终止武人政权的垄断,而恢复王道政治。最后以“歌曰”为总结,文云:

邈自陶唐兮,下至宋康,虽文质沿革之不同兮,靡不由奢俭而兴亡。西柳兮以淫而颠覆,北松兮由侈以流移。煌煌江都,惟德之基,顺天事大,风俗淳熙,于万斯年,安不忘危。

全篇阐述儒家的治国理念,颇为深刻;体制上前面有引文,然后为本文,最后有歌曰等之分,可说具备辞赋传统的三段结构形式。句式也以四言为主,全文500余句,其中有350余句为四言句,几乎占七成。中间亦杂有五、六、七言,八言以上的长句也混用。

因当时科举应试之故,一般流行创作科举律赋形式,但崔滋沿袭汉魏古赋形式而写作《三都赋》,这种格式若无《文选》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他这种创作的实践是对律赋有批判态度的表现。崔滋的《补闲集》中就有表明批评律赋的观点,他说:

及登第后,慕林宗庇郑知常之为四六,窃欲画虎焉,乃今反视从前所作皆生涩荒虚反类狗也,此亦文之骈对者,后因变为帘角音律之赋行于场屋,欲试其代言奏章之才也,由是辞蔓而不精实,意迂而不真切。

不过,社会上一般创作的需求是科举应试的律赋为主,注重讲究声律对仗的科举律赋,所以《文选》中的古赋受冷落,不再成为文章的典范了。因此,到了成宗时,新罗以后官学的学习科目中占重要位置的《文选》是被冷落了。又《高丽史》卷三:

(成宗)十四年春二月己卯,教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之时义大矣哉。予恐业文之士,才得科名,各牵公务以废素业。其年五十以下,未经知制诰者,翰林院出题,令每月进诗三篇赋一篇,在外文官,自为诗三十篇赋一篇,岁抄附计吏以进翰林院品题以闻。

由《高丽史》的记载可知,高丽时代辞赋文学的发展,既有科举的影响,又有国王的鼓励。故一般文士从事创作辞赋的风气更加兴盛起来,这是自然的现象。徐居正《东人诗话》中又提到这时期的盛况,云:

高丽光宗始设科,用词赋。睿宗喜文雅,日会文士唱和。继而仁明亦尚儒雅。忠烈与词臣唱酬。有龙楼集。有是俗尚词赋务为抽对。

时代的要求和国王的奖励,辞赋文学当然兴盛起来,出现了大量的有关辞赋作品。但其形式和内容,和唐律赋一样,讲究声律对仗,使用冠冕正大的题材和主题。若举一篇,就是尹宣佐(1265—1343)的《高祖开设学校广阐道义惟新宝历赋》:

晋家开学,高祖克神,阐道义而为理,致宝历之惟新。特辟贤关,廓着文明之化,更延国祚,奄临遐迩之民。大抵道惟适理之途,义乃为国之宝,苟圣人未能并叙,彼神器尚何长保。然则凡居天位,享基绪之弘延,宜设黉堂,搜典坟而讨论。故孝文化民由学,为政以文,虽未除猾夏之类,每旁求博学之群,勅修儒雅之官,优宣教化,益响灵长之业,蔚启陶熏。何则?欲保皇图,莫如文德,肆设校而施教,多历年以享国。立庠立序,播休风而允厘,有社有民,传景钟于罔极。议夫据义而志远者,须凭经术,遵道而垂裕者,盍借典谟。顾今景祚而可久,盖以交德而诞敷。周世尤长,自辟雍而宣化,鲁邦有永,由泮水之崇儒。此际庙堂之上,定于君臣,闺门之内,笃于亲戚,以忠孝兼修妙化,宜社祚邈垂遐历,复兴儒于洙泗,世格休明,终定业于伊□,邦无离析。方今克明克类,载谋载惟,纵庶事之无阙,念厥位之惟危,乐育贤才,以启成王之理,远垂鸿祚,琼超汉帝之时。小臣性本愚蒙,心无欺诞,愿为传说之霖,得救家之旱,今赴文场,美我皇履道坦坦。

以晋高祖的历史事实来作题材,勉励国王振兴文治。若看篇末的后段内容,就从“方今克明克类,载谋载惟”到“美我皇履道坦坦”的部分,可表明这明明是一篇有关科举的辞赋。另外,现存尹宣佐的赋,如《隋高祖非宴食不过一肉赋》、《太宗观尚书庶几唐虞赋》二篇也和《高祖开设学校广阐道义惟新宝历赋》一样,借中国历代帝王的行迹和事实,勉励当时国王的作品。从这种题材来看,这些作品不是科场应试,或准备应考练习的私试,或国王下令的月课

赋。和尹宣佐的作品一样,以宫廷为中心的律赋,现存的高丽辞赋作品当中亦有,这从作品的题目可看出来,如《李勋应时扫云布唐阳春赋》(闵渍),《道闾一和槐橘合为兄弟赋》(郑义),《成王气禀胎教德与年丰赋》(姜影瑞),《春雷作龙蛇不安于蛰户赋》(李坚),《相如避廉颇以先国家之急赋》(崔滋)等作品。此外,不知作者的,亦有《王者之兴必卜筮决天下赋》、《义于人者和于神赋》、《嗜欲皆同惟贤者节之赋》、《贾谊请猎猛敌不搏畜兔赋》、《汉成帝勿易折槛以旌忠臣赋》、《志士口兴心誓守死无二赋》等六篇。

这种律赋现存共有14篇,其数量在传下来的高丽赋40余篇当中占的比例并不算太多,但当时很多人都可能有此类作品。且看李穡的《观鱼台赋》的后文:

余年十七岁,赴东堂赋和氏璧,二十一岁,入燕都国学月课,吴尚伯先生赏予赋,既归赴癸巳东堂赋黄河,乡试赋琬玉,会试赋九章,今皆不录,非古文也,非吾志也,非吾志而出身于此,非此无阶于营养耳,呜呼悲哉。(《牧隐文藁》)

由此可知,当时文人已经认识到,科体律赋束缚思想,难于表现自己真率的感情。李穡《辞辨》一文中又云:

赋近出也源于三纬,变而骚,所以后赋作矣。辞出于孔氏所以易翼也,今读其文,韵语甚多,其亦本于载歌者欤。楚屈原作骚,变雅之流也,宋玉景差贾谊继起而赋之,源流于是备矣。汉兴武帝作秋风辞,盖本于骚而词益简古,晋处士陶渊明赋归去来辞,又稍驰骋而视赋则尚简,班马出而包络无余,至有十年且就之说吁盛矣,其亦可憾也已,非独文也。凡饰于外者日增,而适于中者日削,枝叶茂而本根弱,甚可怪也。使本根苟壮而扶疏其枝叶也,亦何伤哉,亦何伤哉?

由这篇文章,反映出李穡对辞赋的起源和流传的理解及看法,同时又窥知对当时辞赋的批评,指出疏忽真实的内容,而只讲究形式的倾向。李穡亦有传世辞赋作品,以赋为名的有《雪梅轩赋》、《观鱼台赋》二篇,以辞为名的有《山中辞》、《闵志辞》、《永慨辞》、《自讼辞》、《流水辞》、《东方辞》六篇。先看《闵梅轩赋》,如下:

扶桑翁发深省道根,固心灰冷。萧洒出尘之标,幽闲绝俗之境。炯玉壶之冰出,森瑶台之

月暎。尔乃谢语夺胎，宋句换骨。二赋流传，千载超忽。风人噤以不哗，骚客寂而弥郁。韩山子霜鬓萧萧，麻衣飘飘。思偶然之谈笑，嫌丁宁之唤招。叩剡溪之兰桨，驰庾岭之星轺。忽中道而坎止，乃息牧之相邀。开竹房，俯风棹。展蒲团而加趺，烹露芽而解醒。吟载涂于周雅，想调羹于殷室。是惟无用之用，盖有则于有物。予于是知西域之有教，或于斯而甲乙。两露均是泽也，农桑焉重。桃李均是花也，富贵焉宜。夫孰知雪也梅也吾师也，情境交彻。针芥相随，罔或须臾之离也耶。若夫一枝璨璨，千山皑皑。飞鸟自绝，游蜂不偕。消尘滓于气化，浩大极于心齐。实有助于所学，宜其扁于高斋。今岁月之几何，阻情境之俱佳。异日沉疴，去蹇步平。鸣蓝舆于石径，当一赏以忘情。

李穡在题目之下自注“为日本释息牧叟作”，就是以雪梅为喻，赞扬日本佛僧息牧叟的人品。全篇四言六言为主，但也杂六七言及八九十言的散文句。他的另外一篇《观鱼台赋》，先有序文，云：“观鱼台在宁海府，临东海石崖下，游鱼可数，故以名之，府吾外家也，为作小赋，庶几传之小中原耳。”《观鱼台赋》或许是其后文中表明的“入燕都国学月课，吴尚伯先生赏予赋”。若看本文如下：

丹阳东岸，日本西涯。洪涛淼淼，莫知其它。其动也如山之颓，其静也如镜之磨。风伯之所囊钥，海若之所室家。长鲸群戏而势摇大空，惊鸟孤飞而影接落霞。有台俯焉，目中无地。上有一天，下有一水。茫茫其闲，千里万里。惟台之下，波伏不起。俯见群鱼，有同有异。围围洋洋，各得其志。任公之饵夸矣，非吾之所敢拟。太公之钓直矣，非吾之所敢冀。嗟夫我人，万物之灵。忘吾形以乐其乐，乐其乐以殁吾宁。物我一心，古今一理。孰口腹之营营，而甘君子之所弃。慨文王之既歿，想于物而难跂。使夫子而乘桴，亦必有乐于此。惟鱼跃之断章，乃中庸之大旨。庶沉潜以终身，幸拯衣于子思子。

全文共 224 字，四言六言为主，杂揉七言六句及九言的散句，没有《雪梅轩赋》那么多。两篇都写景逼真，用语朴实，在写景中又融合着抒情和说理。

另外他的六篇辞作品，都使用骚体而抒情，先看《闵志辞》，文云：

闵豫志之温蠖兮，非厥初之有常。慨因物以兴怀兮，惟是非之失当。滃云雾以昼晦兮，将宴息以在床。月皎皎而天净兮，将颠倒其衣裳。夫晨夜之截然有限兮，折柳樊圃而矍矍之狂。胡老大而入于幽谷兮，赧一揖于陈良。尔雅虫鱼之消耗兮，匪有损其何伤。胡诗书之膏腴兮，亦憔悴而无光。悲参商兮孔孟，想仿佛兮虞唐。若可续兮卒莫可续，颓乎将戢而复扬。竟不闻兮馨，杳不见兮羹墙。爰舒徐以视履兮，罔其旋于考祥。好色恶臭纷乎其不决兮，宜鬼域之彷徨。惟人天之大道显而不隐兮，胡求之于渺茫。岁月荏苒以相代兮，衰老侵寻而欲僵。甘艸木之同腐兮，忽惊叹而内伤。貽音好兮春禽，送悲声兮寒。谅须臾之闹耳兮，付一晒于亡羊。哀吾辞之匪足传兮，聊澆之以羽觞。忘形骸以放浪兮，沂冯翼之玄黄。天何言兮物之形，文在兹兮圣道以彰。我辞芜兮翳天庭，誓删繁兮立良。

作者在作品中抒发出沉重的叹息，表达自己对高丽末混乱时期的苦闷。《永慨辞》、《自讼辞》、《流水辞》三篇也用同样的主题来抒发出作者忧国忧民的真率之情。《山中辞》是写处于田园中的闲情。稍有特色的是《东方辞》。此篇是送行郑梦周使日本的作品，借饯别的题材，描写当时日本独特的民情和风俗，完全是叙事写实性质的作品。看其全文：

詹东方之有君兮，肇大始以自尊也。其人佩义而服仁兮，颯气劲而词温也。越世道之升降兮，尚刚烈而专门也。其轻生而敢死兮，何北官黜之足言也。仿周季之战国兮，凜凜乎使人毛竖而惊魂也。嗟来不食兮睚眦必报，上忘父兄兮下忘后昆也。矧妻与舆台兮，视之不啻犬豚也。盖此身兮渐尽，羌名誉兮求存也。士可杀不可辱兮，辱衣冠痛在国也。于民而陶俗兮，亦其宜而何责也。极而罔有不变兮，揖让或在旦夕也。中华衣冠之几更制兮，我乃犹夫古昔也。舟车所至之必通兮，我乃不踰闕也。日出处之天子兮，奄宅扶桑之域也。惟万物之生育兮，谷风之习习也。惟下土之照临兮，乃阳乌之赫赫也。之二者之所出兮，信天下之无敌也。胡群凶之窃发兮，至于今其猖獗也。播恶名于天下而既稔兮，志士仁人莫不为东方惜也。是将动天下之兵端兮，不疑又何卜也。辅车相依兮虞虢是监，楚国亡猿兮祸林木也。既交聘兮

或不以情,上有神明兮司正直也。今其权兮有所在,子其慎兮饮食也。少思虑兮兴居,保厥躬兮供厥职也。睿予词兮笔力衰,言有尽兮意无极也。

和李穡几乎同时期的作家有李达衷(?—1385),他有《思亭赋》、《础赋》二篇传于后世。《思亭赋》是四言六言为主,但也杂揉七言,甚至十三言的散句式骚体。假设主客,而采用问答形式表达自己生活的谨慎态度。若择其一段,云:

因举手而嘘噫曰:彼何山兮,大德之山,穹窿起复,如往而还,云烟暗暗,松柏攒攒,吾考若妣,寿藏所安。吾之居是亭也,僂然如见其容止,肃然如承其指使,体不敢肆,言不敢易,饮不敢醉,食不敢旨,睦亲姻不敢弃,敬宾客不敢戏,穷不敢屈己,达不敢肆志,吾之身,吾父母之所赐也,何尝忽于造次。自吾之季若昆,暨后之子若孙。思吾所以名亭之义,世守而不谖焉,则可谓无忝尔家门也。吾扁之意止此,幸子无以为言。客恍然曰,美哉言乎。凡为人子之职者,登是亭而无赧色,则吾国庶乎其国矣,因缀之辞,以自警飭。

他的《础赋》句法是四言最多,共有45句。次六言,有17句。也有七(1)、八(1)、九(1)、十(2)、十一(1)言的散句。这是一篇寓意深刻的作品,形式是把础和楹拟人化,以础比喻平民百姓,以楹比喻王室君主,互相问答,最后借匠石之言,表达国家最基本的础,就是一般老百姓,此之重要是无法比拟的。若看最后段落,云:

适有匠石,闻而议之曰:谦能受益,高必易危,彼楹之寄,惟础是资,录础名于上面,且以楹而次之。乃赞曰:础乎础乎,盘然而安,安其如盘,王室之赖,帝王之完,础乎础乎,楹胡敢谩。

三

上述的辞赋作品以外,高丽时期还有三个重要作家的辞赋传于后世,这就是金富弼(1075—1151)、李仁老(1152—1220)、李奎报(1168—1241)。

金富弼是一个非常崇拜宋代苏轼的作家,他的辞赋有《仲尼凤赋》、《哑鸡赋》二篇。《仲尼凤赋》全篇358字,采用句法以四言六言为主,也使用十二句的七言,六句的八言,二句九言,一句十一言等。全

篇的内容是把孔子比拟凤凰而歌颂之,表达高丽文人对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敬仰。篇首破题云:“仲尼乃人伦之杰,凤鸟则羽族之王。”然后,接着歌颂孔子仁义之德行,写得典雅恳切、条理明晰,把握了儒道治国平天下的内涵:

何其名之稍异,舍厥德以相将,慎行藏于用舍之间,如知出处,正礼乐于陵迟之后,似有文章,夫子志在春秋,道屈季孟,如非仁智之物,孰肖中和之性,相彼凤矣,有一时瑞世之称,此良人何,作百世为师之圣,于以其文炳也,吾道贯之。

最后又云:

小儒青毡早传,镂管未梦,少年攻章句之雕篆,壮齿好典谟而吟讽,钻仰遗风,勃深期于附凤。

表达自己学孔、慕孔的志愿。《哑鸡赋》是一篇咏物而别有寄托、以物明志的小赋,共183字,篇幅较短,句法为全部采用六言。赋云:

岁峥嵘而向曛,苦昼短而夜长。岂无灯以读书,病不能以自强。但展转以不寐,百虑萦于寸肠。想鸡埭之在迹,早晚鼓翼以一鸣。拥寝衣而幽坐,见窗隙之微明。遽出户以迎望,参昴澹其西倾。呼童子而令起,乃问鸡之死生。既不羞于俎豆,恐见害于狸猩。何低头而瞑目,竟缄口而无声。国风思其君子,叹风雨而不可。今可鸣而反默,岂不违其天理。兴夫狗知盗而不吠,猫见鼠而不追。校不才之一揆,虽屠之而亦宜。惟圣人之教诫,以不杀而为仁。倘有心而知感,可悔过而自新。

李仁老的辞赋作品有《红桃井赋》、《玉堂柏赋》、《和归去来辞》三篇。其中的《和归去来辞》,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刻意模仿晋代陶渊明,写得颇有趣:

归去来兮,陶潜昔归吾亦归。得隍鹿而何喜,失塞马而奚悲。蛾赴烛而不悟,驹过隙而莫追。才握手而相誓,未转头而皆非。摘残菊以为餐,缉破荷而为衣。……功名须命,迟宜归休。任浮云之无迹,若枯槎之漂流。已矣乎,天地盈虚自有时,行身甘作贾胡留,遑遑接浙欲安之。风斤思郢质,流水忆钟期。屎死灰兮奚暖,播焦谷兮何籽,第宽心于饮酒,聊遣兴于作诗。望红尘而缩头,人心对面真九疑。

赋中句式构造亦有创新,虽以四六言为主,却又学习

六朝赋，间用五、七言诗句的体例。李圭报留传下来的辞赋作品较多，有《畏赋》、《梦悲赋》、《放蝉赋》、《春望赋》、《祖江赋》、《陶器赋》、《命斑葵文》、《呪鼠文》、《驱诗魔文》、《异相者对》等十篇，题材和体制都较丰富。其《放蝉赋》名为咏物却寄寓了人生感慨，对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险恶作了深入揭露：

彼黠者蛛，厥类繁滋，孰赋雨以机巧，养丸腹于纲丝，有蝉见□，其声最悲，我不忍闻，放之使飞。傍有人兮谁氏子，仍诘予以致辞，惟兹二物，等虫之微，蛛于子何损，蝉于子何裨，惟蝉之活，乃蛛之饥。此虽德君，彼必冤之，孰谓子智，胡放此为。予初曠额而不答，俄吐一言以释疑，蛛之性食，蝉之质清，规饱之意难盈，吸露之肠何营。以贪污而逼清，所不忍于吾情，何吐绪之至纤，虽离娄独不容睛，矧兹虫之不慧，岂覘视之能精。将飞过而□□，翅拍拍以愈嬰，彼营营之青蝇，纷逐臭而慕腥。蝶贪芳以轻狂，随风上

下以不停，虽见罹而何尤，原厥咎本乎有求。独汝与物而无竞，胡为遭此拘囚，解尔之缠缚，囑汝以绸缪，遯乔林而好去，择美荫之清幽。移不可屡兮，有此纲虫之窥觐，居不可久兮，蟪蛄在后以尔谋，慎尔去就，然后无尤。

其《祖江赋》是贬官之后的作品，抒写自己悲愤之情。序云：“贞佑七年四月，予自左补阙被劾，寻除桂阳守，将渡祖江，江水本迅激，适值暴风，因而后济，为赋以悲之，卒以自宽。”可见作赋的心态。试看赋文：

浩浩江流，浊如江水，漆色而泓，惧难俯视。湍又激而迅兮，岂瞿塘之足譬，控百川之奔曾兮，若鼎汤之惊沸。蛟鳄呀呀以流涎，又安测毒龙之潜伏以伺，泝滩欲径进兮，船如行而尚止。不夕而暝，不风而波，雪浪礧石以崩腾兮，若秦晋战于彭衙，篙工狎玩灵胥兮，犹畏夫洄湓與与盘涡。……

限于篇幅，李圭报其它赋文兹不一一评介了。

Survey of South Korea Fu During Gaoli Dynasty

BAI Cheng-xi

(Chinese Department, Dongguk University, Joonggu, Seoul 100—715, Korea)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outh Korean literary men in the Kaoli Dynasty created with intense interest and with their ow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many Chinese fu writings of scenery-describing, event-recording, thing-chanting, feeling-expressing and ambition-stating in content and of lvfu, saotifu, santifu and piantifu in form. It is a precious historical literature heritage of South Korea as well as evidence of distant origin and long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China.

Key words: South Korea; Kaoli Dynasty; cifu; creation

[责任编辑:唐 普]